



旧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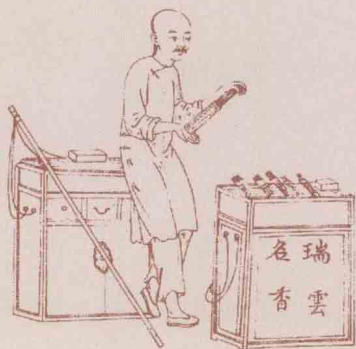
杂

记

〔美〕亨特◎著 沈正邦◎译 章文钦◎校

旧 中国 杂 记

〔美〕亨特◎著 沈正邦◎译 章文钦◎校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旧中国杂记.1/[美]亨特著;沈正邦译 章文钦校.—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12(2000.11 修订本)
ISBN 7-218-00915-8

- I. 旧…
- II. ①亨…②沈…③章…
- III. 中国—近代史—史料
- IV. K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3523 号

| | |
|------|--|
| 责任编辑 | 曾宪志 柏 峰 |
| 封面设计 | 张竹媛 |
| 责任技编 | 黎碧霞 |
| 出版发行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 经 销 |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排 版 | 岭南文化发展公司 |
| 印 刷 | 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 |
| 开 本 |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
| 印 张 | 10.5 印张 |
| 字 数 | 210 千字 |
| 版 次 |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4001—8000 |
| 书 号 | ISBN 7-218-00915-8/K·209 |
| 定 价 | 19.00 元 |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中译本序言

陈胜彝

—

美国人亨特 (William C. Hunter) 是《旧中国杂记》 (*Bits of Old China*) 和《广州“番鬼”录》 (*The Fankwae at Canton*) 两书的作者。他于 1825 年到达广州时, 只是一个 13 岁的少年。旋被派赴马六甲英华书院学习中文, 次年返回广州。1829 年在广州加入美商旗昌洋行, 1837 年成为该行合伙人。1842 年退休, 1844 年返回美国。其后又回到中国, 在广州、澳门、香港等地活动达 20 年, 并创设亨特洋行。晚年旅居法国, 1891 年, 在旗昌洋行倒闭的几天后, 他在法国尼斯去世。

《广州“番鬼”录》主要描述在 1844 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以前, 外商在广州口岸活动的情形, 这本《旧中国杂记》则着重描述中国方面的情形。西方殖民者和史学家习惯于把鸦片战争前的中

国称为“旧中国”，以相对于在不平等条约之下向西方列强开放的近代中国。因此，书名的“旧中国”这一概念，带有殖民主义的色彩，这是我们阅读本书时首先应注意的。书中所记的年代，有的迟至 19 世纪末期，但重点还是 1844 年以前的 20 年间。所记的范围包括中国及海外，但重点则在中国南部，特别是广州和澳门。两书虽然编次散乱，缺乏系统性，但各有侧重，可以互为补充。

二

作者是鸦片战争前广州仅有的几个懂中文的外国侨民之一。终其一生，在中国生活的时间长达 40 年，经历了中西关系的深刻变化，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情形也有一定的了解。书中所记虽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倾向，但将其作为资料书来读，仍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在鸦片战争前广州口岸中西贸易的封建外贸体制之下，行商负责与外商贸易，并同其属下的通事、买办共同管理约束外商。据行商后人称，十三行全盛时，“洋人往谒行商，皆徒步，不得乘轿……行商至夷馆，则乘轿，外人并须出迎。外人见行商，皆旁立，弗敢坐。”（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国立编译馆 1937 年，页 198—199）然而，在鸦片战争前夕，作者笔下的行商，对外商巴结讨好不遗余力，竞相邀请外商到私宅饮宴游玩，有的还让妻妾出见，夜阑席散，又让仆人抬着自己的轿子，打着写有自己姓氏的灯笼，将外

商送回商馆。每逢中国新年，行商须到商馆向外商拜年，给商馆上下人员送礼。如此等等，说明这时行商内部的分化日益明显，对外商的依赖日益加深，中外商人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而外商则勾结行商、通事、买办和政府官吏，共同破坏清政府用来防范约束外商的各项章程，使其名存实亡。作者自称：“我们满不在乎地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用各种方法“使得任何事情都顺利进行，而和对我们作出的命令完全相反”。（《外商在广州生活之谜》）

对于鸦片战争，作者站在殖民主义立场，炫耀英国侵略者船坚炮利，吹捧英国侵华的重要角色义律“是个好人”。把一首记述 1841 年英军进犯广州与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歌谣《战舰火轮船图解》说成“从头到尾都是假的”。但他毕竟把整首歌谣译成英文，保存了珍贵的史料，可与张维屏诗《三元里》及其他史料互相印证。此外，书中对某些行商利用战争骗取功名，个别清军将领贪生怕死的行径亦有描述。

近代西方列强同中国封建统治者一样仇视农民革命。作者对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和响应太平天国革命的两广天地会起义均持否定态度。“增步的叛乱”一节，详细记述作者在 1854 年广东天地会起义期间，通过原天宝行商梁纶枢（经官）的居间，与清政府达成一笔交易，建立一支由一百多名外国流氓组成的雇佣军，为清政府夺取义军首领何阿六的根据地——增步镇。报酬为 25 万元，并由清政府向指挥雇佣军的船长德里克颁发一张“提督”的委任状。而作者则作为“关键人物”，充当“匿名合伙人”。只是由于美国公

使麦莲当时奉行“中立”政策，召见作者，下令解散雇佣军，这一计划才未能实行。但它可以作为中外反动派互相勾结，共同镇压中国革命的较早实例，也是若干年后，外国流氓在江浙组织洋枪队和“常胜军”、“常捷军”，配合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先导。

作者基于其反动立场，诬蔑洪秀全的“邪恶生涯”造成无数人“生命的损失和那样多的痛苦”，却把“屠夫”叶名琛残杀起义者和无辜群众的罪恶行径说成“合法屠杀”、“有功于民”。然而他毕竟记录了所谓“合法屠杀”的真相。据说当时“每天有 800 名被捕的叛乱者在刑场被斩首，而且一连杀了好多天。如果一天只有 300~400 人被处决，就认为是很少的了”。在清军攻下增步镇时，“按最低估计，在镇……东边，死亡人数就超过 2500 至 3000 人；而镇内和镇西边还有大量的人被杀死”。书中展现了清政府在刑场上和战场上的一幕幕杀人场面，可与容闳《西学东渐记》中的有关记载互为补充。

书中对当时广州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作者笔下的行商，大多园宅幽雅、饮食精美、服饰华丽、妻妾成群，可以作为当时广州上层社会日常生活的写照。作者的笔墨，又触及到广州下层社会的众生相：有背着一块招贴牌沿街卖药、担着一担水桶装着活鱼沿街叫卖、在商馆前面的广场卖茶水曲本、专门进商馆向外国人兜售古董工艺品等各式各样的小贩；有补锅、补碗的手艺人；有为了学习广东英语，准备日后依赖贸易为生而到商馆服役的仆人；有排成纵

队，拄着拐杖，向人行乞的盲丐；有向过路的“番鬼”扔石寻衅的“西关烂仔”；还有为了一点钱替人受极刑的穷人。这些描述，与作者友人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留传下来的穗澳街头人物速写，有异曲同工之妙。

书中有几节取材于各类店铺介绍货品的招牌纸，其内容除介绍本铺货品及信誉之外，一再提请顾客谨防假冒，为此不惜更换铺名，或采用专门纸张作招牌纸。从中可以一窥当时的商界情形。而一份由寺院印发，在街头售卖的禁止屠宰耕牛的宣传品，既体现佛教禁止杀牲的教义，又体现中国人重农爱牛的风俗。

作者一再提到广州的书肆和发达的印刷业，连海幢寺和行商潘家都设有印刷作坊。作者在广州一带走动时，发现每一个城市村镇，都有自己的学校，到处可以听到学童的朗朗书声。他见到广州大户人家的私宅请客饮宴、寺庙里举行宗教仪式、天旱时祈神求雨都有演戏，因而说：“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热衷于演戏的了。”（《补破瓷器的人》）透过这种种描述，可了解当时广州的文化教育方面的一些情形。

关于当年广州的水上交通，作者描写了浮家泛宅，终年在珠江上飘泊的昼家艇，在珠江河上谋生的小贩、工匠、木匠、鞋匠、裁缝、剃头匠、算命先生、应急郎中的小艇，装饰华丽的花艇，驳运进出口货物的西瓜艇，走私鸦片的“扒龙”、“快蟹”艇，挤满乘客、来往河南或花地的渡船，插着各色旗帜的官船，属于盐商所有的盐船等等，简直是一个浮动世界。

澳门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在1849年葡萄牙殖民者

强占澳门以前，中国对澳门享有完整的主权。清政府把澳门作为葡萄牙殖民者和西方各国商人、传教士的共同居留地，在行使中国对澳门主权的同时，允许葡人有一定的自治权。作者却把澳门说成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宣称葡萄牙对澳门拥有主权。然而，书中介绍了几个长期居留澳门的西方侨民，如翻译《圣经》、撰写《华英字典》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因从事鸦片投机失败，晚年穷途潦倒，自杀身亡的散商托马斯·比尔；为逃避债务和妻子的纠缠，从加尔各答来到澳门的画家乔治·钱纳利；瑞典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最后一位主任，晚年以研究澳门历史终其身的龙思泰爵士等。这些，恰恰说明澳门当时是西方各国侨民的共同居留地。而龙思泰关于澳门史的著作，就否认葡萄牙对澳门的主权。出于对澳门历史的无知，作者关于澳门早期历史的叙述，杂糅各种传说，错漏迭出。然而，对于澳门优美的环境、气候和当时情形的描写，却是真实可靠的。

作者在 1825—1826 年，曾往新加坡和马六甲，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度过 16 个月的学习生活。书中把 16 世纪初侵占马六甲的葡萄牙印度总督阿尔布克尔克称为“伟大的阿尔布克尔克”，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开拓海峡殖民地的“西方勇士”的怀念之情。然而，书中对马六甲英华书院的记载，却为后人留下有关这所学校的极为难得的史料。对中国人在新加坡和马六甲活动的记载，更是今天研究华侨史的稀珍资料。作者写道，在西方殖民者建立海峡殖民地的几个世纪以前，中国人已来到这里从事垦殖和经营。新加坡有中国人居住的

国城，马六甲有中国人的墓地中国山。在 19 世纪初期，马六甲的中国人（包括华人甲必丹在内），都是土生华人。在马六甲郊外密林中的一块块开垦地，有一处处中国人居住的茅屋。中国的垦殖者不怕毒蛇猛兽的威胁，“穿着同样的衣服，用着同样的工具和器械，他们毫无疑问已经用着同样的东西孜孜不倦地工作了许多世代了”。在马六甲以至整个马来群岛的中国人，“顽强地保持他们固有的风俗习惯，他们也同样顽强地保留着他们祖国的传统”。他们凭借着勤劳、勇敢和智慧，把马来群岛的“咖啡和胡椒种植园、锡矿、粮食和香料的种植业等等，都掌握在他们手中”（《1825—1826 年在新加坡和马六甲》）。

三

英美殖民者在鸦片战争前数十年，就对“中国地利人事……日夕探习”。（姚莹：《东溟文后集》，同治六年重刊，卷八）他们利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培养了熟悉中国和熟悉中文的人才。作者就是这样的人才之一。本书关于中国的记述，内容涉及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人情风俗等各个方面，与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另一位传教士卫三畏所撰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的有关记述声气相通。他们介绍中国的目的，是为资本主义的侵华活动开路的。然而，我们在注意到其殖民主义倾向的同时，仍然可以从中看出当时西方人对中

目 录

| | | |
|---------------------------------|-----|----|
| 中译本序言····· | 陈胜彝 | 1 |
| 第一版序言····· | | 14 |
| 第二版序言····· | | 16 |
| 外商在广州生活之谜····· | | 1 |
| 外国水手的游散日····· | | 3 |
| 到花地饮宴····· | | 8 |
| 商馆的广场····· | | 15 |
| 在行商公所审讯印度水手····· | | 24 |
| 考克斯医生为中国病人出诊····· | | 33 |
| 试住商馆····· | | 35 |
| 中国客人吃“番鬼”餐····· | | 38 |
| 一间糖果铺、一间香木串珠铺和一间墨铺的 招牌纸····· | | 44 |
| 一家印度行号的来信····· | | 47 |
| 浩官只说过一次笑话····· | | 48 |
| 玉石····· | | 49 |

| | |
|---------------------|-----|
| 小铭官从军记 | 51 |
| 青铜瓶和青铜鼎 | 60 |
| 罗马天主教信使被捕 | 61 |
| 一位官员的来访 | 66 |
| 乌龙茶 | 71 |
| 长寿寺 | 73 |
| 河南一位西班牙传教士的墓 | 80 |
| 木匠广场 | 84 |
| 托马斯·比尔 | 84 |
| 潘启官的乡间住宅 | 91 |
| 增步的叛乱 | |
| ——无名氏《伙记史诗》二篇 | 95 |
| 补破瓷器的人 | 125 |
| 公债 | 135 |
| 案件的审判 | 137 |
| 公学 | 139 |
| 宗教 | 140 |
| 民主的内涵 | 141 |
| “番鬼”与中国风俗 | 143 |
| “中央王国”的来历 | 149 |
| 钦差大臣耆英 | 151 |
| 巡游招贴 | 156 |
| 悬赏启事 | 158 |
| 牛的控诉 | 159 |

| | |
|-------------------|-----|
| 龙舟节的起源····· | 161 |
| 中国的土著居民····· | 163 |
| 古老中国的缔造····· | 164 |
| 澳门的老侨民····· | 166 |
| 广州的大旱灾····· | 183 |
| 斩首和凌迟····· | 185 |
| 关胜对“面包和鱼”的看法····· | 187 |
| 午时茶····· | 191 |
| 从悉尼到达广州的逃犯····· | 192 |
| 海幢寺····· | 196 |
| 一家熔金铺的招牌纸····· | 198 |
| 《朝报》····· | 199 |
| 古伯察神甫····· | 200 |
| “南京人”····· | 204 |
| “航海家号”船员被杀案····· | 207 |
| 船长格里布尔被捕····· | 209 |
| 1841年战争附记····· | 212 |
| 广州城的创建····· | 217 |
| 九层宝塔····· | 219 |
| 绉纱铺的招牌纸····· | 222 |
| 广州的清真寺····· | 223 |
| “特劳顿号”的灾难····· | 224 |
| 住宅的建造····· | 226 |
| 一场大火灾····· | 228 |

| | |
|---------------------------|-----|
| 孔子轶事 | 230 |
| 中国印刷术的起源 | 234 |
| 行与保商 | 240 |
| 十三行商馆平面图 | 244 |
| 中国的新年 | 246 |
| 中国文字的起源 | 251 |
| 坎宁和开瓶塞的巴科斯 | 253 |
| 1825—1826 年在新加坡和马六甲 | 255 |
| 乔治·钱纳利 | 289 |
| 广州划船俱乐部 | 302 |

外商在广州生活之谜

广州城郊称为“十三行”的那一部分，在订约以前是“番鬼”居住的惟一地方。在人们的想象中，这里的生活受到许多限制，长期和当局冲突、审讯、恐吓、人身危险，以及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故的普遍的不稳定。的确，我们是被吩咐要“听话和服从”，要“惶恐战栗”，不可“冥顽不驯，以致干犯圣怒”！但是这些已成为老生常谈！我们一再被提醒，“我们被容忍在这块地方暂住，是由于天朝对远来夷人的仁慈和怜恤”，等等。这些都是口头禅！

我们被一再恐吓，“如果我们继续贩卖‘洋土’给人们，就一定会遭到最严厉惩罚；因为他们的健康受到损害，堕入苦海，同时又使贵金属流出国外。实在不能再容忍下去了”。而我们却像往常一样继续贩卖这种麻醉品。碇泊在伶仃的我们的趸船受到警告，不能再在该碇泊所逗留，必须“立即驶入港口，或各自驶回本国”。这位“奄有四海”的统治者虽然慈悲为怀，“但是现在不能再事延宕，将派巡船对它们进行毁灭性的轰击”！尽管受到这样的恐吓，趸船丝毫没有移动。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会使人觉得我们的生命和自由毫无保障！除

了一个月三次固定的日子之外，我们被“禁止外出游荡，而且永远不得离开一名通事”。但我们只要高兴，就出去散步，而且想在外边呆多久就呆多久，很少有通事跟着。每一个“番鬼”在茶叶贸易季节结束时，都必须离开广州，乘船返回本国，至少必须撤往澳门；而且住在商馆的时候，不能走到比牡驴尖（Jackass Point）^{〔1〕}更远的地方。每座商馆只准许雇用八名中国人照料，担任“挑水、扫地、做饭等工作，而由一名买办管理一切”；然而实际人数是毫无限制的。商馆与黄埔船只之间的走私活动，是严刑禁止的；而那些监守者，如海关派往黄埔监视每一艘船的艇夫，以及在小溪馆和瑞行前面的海关官吏，却往往为了一笔小费而乐为居间，使我们免去这种事情的一切麻烦。

按照规章，我们“不得擅自前往城门呈递禀帖，否则会失去天朝皇帝陛下对我们的眷顾”；但我们还是照样到城门去，而那里的卫兵却保护我们不受众人的侵扰。官员们也会马上出现，一面温和地责备我们“任性妄为，有违天子圣意”，一面接受禀帖；还会同我们作一次简短而愉快的谈话，给我们上茶，也接受我们递上的雪茄烟，然后退去，吩咐将放了我们进来的卫兵加以“杖责”。我们则高兴地步行返回商馆^{〔2〕}。

〔1〕 校注：牡驴尖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新商馆前面的陆地伸入珠江的地角，英公司在该处设有小码头。中文原名不详。

〔2〕 校注：参阅《广州“番鬼”录》中“呈递禀帖”一节。

就这样，还用了很多别的方法，使得任何事情都顺利进行，而和对我们作出的命令完全相反。我们满不在乎地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照料我们的生意、划船、散步、吃喝，使岁月尽可能过得愉快一些。

缔约前在广州的生活和贸易，实在有点像斯芬克斯那样，是一个难解的谜。同时没有人会过于担忧，正如一句中国俗语所说的那样：“生在苏州，住在广州，死在柳州。”^[1]

外国水手的游散日

按照“老规矩”，在黄埔的船只，将船上的一切事情弄得井井有条之后，就可以给全体船员一个“游散日”，到广州去。

在整个航程中，人们都在谈论和期待着独一无二的这一天，所有的计划就是打算到那里去花掉一个月的工钱。黄色的南京布裤子、帆布鞋、草帽，混杂着黑绸的围巾、糖姜、画在宣纸上的绘画，还有火石、火绒和拜神用的线香，种种景象混杂在一起。盼望已久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船只被弄得整整齐齐，所有东西都用帆索收拾妥帖，这时就指派一个人在岸上全天守望，还有一个人隔不多久就替换他。趁着早潮，12至15名水手由一位船副率领，离开大船。人人都穿

[1] 译注：原文如此。